

主编的话

辉映于天地间的文化瑰宝

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,展现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风貌和审美志趣,是辉映于天地之间的文化瑰宝。永州摩崖石刻,则是永州“人文之书”的精彩华章和精美插图。

9月18日至今,“摩崖上的中兴颂——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。这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晋京大展,广受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。

10月17日上午,由中国历史研究院、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,永州市委、永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“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与文化”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,进一步挖掘永州摩崖石刻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。

永州,古称零陵,地处潇、湘二水交汇之处,是荆楚至岭南的水运要冲和湘桂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,享有“潇湘”之美名。境内山水相依,景致绝佳,水清石秀,宜于镌

刻。自古以来,摩崖石刻蔚为壮观,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余方,数量之多,品位之高,国内罕见。

永州摩崖石刻兴盛于唐代,历经宋代流行、明代追摹和清代考据的千年积累,形成了浯溪碑林、阳华岩、朝阳岩、九疑山等多处摩崖石刻群景观,呈现出历代诗文同处一崖的独特文化现象。浯溪一崖,镌刻着《大唐中兴颂》《大宋中兴颂》《大明中兴颂》,引后世文人写诗评碑、论人记事,抒发对国家强盛的赞美与喜悦之情。苍崖丹壁,以欢快的调性,记录着历代文学大家的记文、诗刻、铭记、题名、榜书,可谓一部“石头上的文学史”。

展览精心遴选自唐至近代永州摩崖石刻拓片近60件(套),分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“民安国定,摩崖颂中兴”以历史为主线,重点展陈《大唐中兴颂》《大宋中兴颂》《大明中兴颂》等石刻拓片。其中,以元结撰文、颜真卿书写的

《大唐中兴颂》最负盛名,是颜真卿一生中唯一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。第二部分“地缘人彰,山水绿潇湘”以人文为主题,重点展陈历代名家大师在永州留下的珍贵墨宝。其中,怀素小草《千字文碑》与大草《千字文》石刻,在书法史上,被世人合称为“双壁”;苏轼《荔子碑》乃韩愈撰文记载柳宗元事迹的书法石刻,文化价值极高;《浯溪诗刻》作为米芾的早年代表作,有效弥补其早期纸绢墨迹稀少的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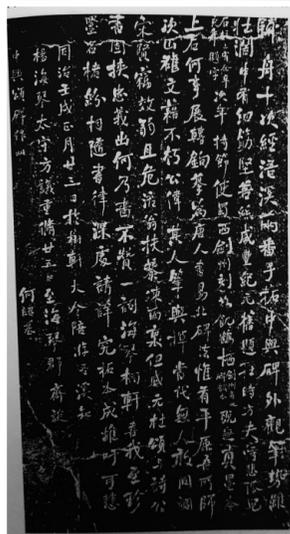
此次研讨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全国性重要学术交流,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,围绕文学史、书法艺术、历史学、古文献研究、数字网络传播以及摩崖石刻、潇湘文化与文旅发展研究等议题,进行了交流发言,深入探讨永州摩崖石刻中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。本期精选了部分专家发言,以飨读者。



苏轼《荔子碑》



榜书《九疑山》



何绍基碑刻

大美不雕

《大唐中兴颂》的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



颜真卿《大唐中兴颂》

潇湘摩崖石刻的八个特征

张京华

摩崖石刻是石刻中的一个单独类型,而潇湘摩崖堪称摩崖石刻的典型。概括而言,潇湘摩崖石刻具有八个主要特征。

一、摩崖石刻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,紧密镶嵌于山水之中。元结反复称道了“零陵水石”,这种基于丹霞地貌、喀斯特地貌的人文创造,可以称之为“水石文化”。摩崖石刻承接中国传统宇宙观和人文观,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类从自然到人文的创造性转换。

二、摩崖石刻形制阔大,具有比竹帛、卷轴和活碑更加恢弘的视觉。中国文字,始于契刻,不始于书写;始于刀笔,不始于毛笔。“古之帝王,刻于泰山,可省读者七十二家”,是最早的摩崖石刻。中国最早的石刻,首推夏禹治水碑,又称岣嵝碑、岣嵝山碑、禹碑、神禹碑、禹王碑。《大唐中兴颂》形制巨大,全文332字,石刻高300公分,宽320公分,字径约15公分。世称之曰“摩崖碑”。

三、摩崖石刻主题集中,叙事宏大,一个摩崖地往往有一个集中表达的主题。玉管岩在九疑山下,故主题为纪咏帝舜。月岩在道州,邻近濂溪故里,故主题为理学、为太极。阳华岩刻元结《阳华岩铭》,故主题为贤人隐逸。朝阳岩刻元结《朝阳岩下歌》,追慕汉魏先贤,故主题为纪咏先贤、寓贤。浯溪刻《大唐中兴颂》,故主题为历代中兴。大凡唐宋以来的重要话题,诸如唐虞之道、理学渊源、盛唐气象、古文运动、潇湘八景、唐宋八家、寓贤乡贤、王朝复兴,都可以在摩崖石刻上找到痕迹。

四、摩崖石刻风格活跃、达观浪漫,具有更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。潇湘摩崖石刻就其文献内容而言,以文学和书法为主体。在文学方面,可以称之为“石刻上的文学史”,或者简称为“摩崖文学”。在书法方面,可以称之为“摩崖书法”。“不到潇湘岂有诗”,潇湘摩崖石刻大多沿江分布,水清石白,风景秀丽,文学、书法得江山之助而闪烁古今。

五、潇湘摩崖石刻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、阶段性和空间上的群居性、共生性。唐代开辟,宋代流行,明代追摹,清代考辨,1200年间跟帖打卡,迄无间断。众多摩崖石刻景区沿潇湘水路分布,成点、成线、成片,最终汇聚成潇湘摩崖石刻群,总量居全国之首,其中浯溪碑林更有“南国摩崖之最”之称。

六、摩崖石刻是交叉学科,冷门绝学。摩崖石刻往往僻居郊野,寂静深山,“其丰碑高至寻丈,或在危崖绝巘,人迹不到之区,羸粮裹毡,架梯引绳,然后得之”。摩崖石刻景区均为唯一的、不可替代的、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。

七、摩崖石刻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史。明代黄焯有《两岩集》,陈斗有《浯溪集》,清代王士禛有《浯溪考》,金石考辨有王昶《金石萃编》,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,宗需《零志补零》,等等。

八、摩崖石刻景观是古代的打卡网红地,是绝佳的传统文化教育素材,是呈现的现代文旅线路。摩崖石刻是1200年以来的文物遗存,是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。苍崖丹壁,点画犹然,“字如其人”“见字如面”。于此便与古人相接,衣冠音容,如在目前,光风霁月,会然于心。

(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、教授)

在造型上特别用意的颜体特征,一点一滴,着意追求点线的造型美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中有一部分字,延续了前期作品对造型美的追逐,这些和上面的作品气息相通,一脉相承。

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字,显然有脱略点线雕琢、追求大朴之美的意向。这一部分作品,在书法审美上更有意义。因为从写实到写意,从华美到拙朴,从满足视网膜,到满足心灵,是书法从实用到艺术的飞跃,是书法家生命和艺术境界的从生涩到成熟的升华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以其雄浑朴茂,烂漫天骨之趣味,开颜真卿书法新境,这是颜真卿艺术走向巅峰的先声。

历代名家眼中的《大唐中兴颂》

唐人尚法,颜真卿的楷书,在书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,自不待言。因此颜真卿的诸多作品,都得到历史的广泛赞誉。而《大唐中兴颂》,尤其得到很高的评价。原因有两个:一是成熟期力作;二是气象峥嵘而圭角深藏,大朴不雕。

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在书法史上也以擅写大字著称,他对大字的形式特别敏感。在《论作字》诗中说:大字无过雍鹤铭,晚有石崖颂中兴。这里他把《大唐中兴颂》和书法史上被称为“大字之祖”的名品、三国时代的《瘞鹤铭》并列,可见他的高度赞赏。

元代书家对《大唐中兴颂》的评价也很多。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个作品的气象,脱略雕琢,雍容博大。元代学者郝经认为:“书至于颜鲁公,鲁公之书又至于《中兴颂》,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。”

明代王世贞在《弇州山人稿》中评曰:“字画方正平稳,不露筋骨,当是鲁公法书第一。”

清前期著名学者杨宾在《大瓢偶笔》中称赞《大唐中兴颂》曰:“古劲深稳,颜平原第一法书也。”

晚清杨守敬在《学书途言》中说:“《中兴颂》雄伟奇特,自足笼罩一代。”

上述几位书家都肯定了《大唐中兴颂》自然朴茂的风格特点,同时表达了一个观点:这是颜真卿书法的极品,法书第一;这个作品境界不得了,足以“笼罩一代”。

《大唐中兴颂》的意义

中国艺术的最高本质和追求:自然者为上品之上。对于中国艺术来说,“不似则欺世”“太似则媚俗”(齐白石)。书画笔墨,既不能空洞无物,也不能简单描形;所贵者,在形式和对象之间,若即若离,恍兮惚兮,留下虚空,形成虚实相生的意象,由此而构成独特的审美世界。

《大唐中兴颂》在颜真卿楷书的系列里,承载了这样的历史性跨越:从追求简单直白实用的楷书造型美,向质朴浑成、大美不雕、峥嵘气象的摩崖石刻山林野逸之趣转化。而后者,正是书法从追求简单直白的赏心悦目(服务于快捷愉悦的实用阅读)的实用艺术,向可以博究天人、化大千世界于氤氲笔墨、尺素之间可以展开宏大“书法视觉叙述”的“纯艺术”(写意,服务于艺术家心灵和智慧)飞跃的新起点。这种基于楷书基本造型结构,但在审美趣味上游离于楷书雕琢形体之上,带有楷书“非写实性书写”的书法意趣和表现手法,在颜真卿《大唐中兴颂》出现,后来到清代随着碑学大倡而风靡天下,最终形成离披烂漫的碑学书法长河巨流。

在这一点上,我们不得不说,永州浯溪摩崖巨制《大唐中兴颂》在书法史上有特别的历史意义。它承前启后,把发端于先秦金石的非书写金石刻铭书法意趣,通过其楷书的创作,向当时及后来的习书者作了历史传递。碑学,整个书法史自然书写之外重构的“书法第二自然”即“纯书法视觉语言”的逻辑展开,有《大唐中兴颂》的一份传承之功。

(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党工委书记、秘书长,一级巡视员)

郑晓华

《大唐中兴颂》是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。颂的作者元结,是颜真卿的好友,唐代著名文学家,曾任荆南节度判官。在安史之乱临近平定,元结有感于唐王朝“扫除妖灾,瑞庆大来”,为“歌颂大业,刻之金石”,写了著名的《大唐中兴颂》。十年后,他丁母忧隐居浯溪,看到“湘江东西,中直浯溪,石崖天齐,可磨可镌”,又勾起了镌石旧念。于是请颜真卿书丹,“刊此颂焉。”这就是浯溪摩崖皇皇巨制楷书经典名作《大唐中兴颂》的由来。

《大唐中兴颂》的审美特征

颜真卿写《大唐中兴颂》时已经63岁。63岁,对书法家来说,正是艺术的盛年。经历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,和艺术上的长期浸润淬炼,他的书法风格已趋于成熟,“纯以神行”。超越了形式技术锤炼、雕琢的层面,书法由生命自然运化。气象峥嵘,但圭角不露,风格平和、内敛,一如苏轼与二郎侄书所说:“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其实不是平淡,绚烂之极也。”

比较颜真卿的作品,有早年的“雕”与晚期的“不雕”,反映了一个书法巨匠的成长历程,也是一个书法家成长、成熟的必然经历。我们看《多宝塔碑》(44岁)《郭家庙碑》(56岁)《颜勤礼碑》(60岁)等,诸碑风格同中有异。共同的特点,是

元结与“水石文化”

程章灿

永州摩崖石刻的大量出现,与中唐诗人元结个人的关系特别密切。生性浪漫的元结是永州水石的发现者、欣赏者和开发者。他以摩崖的方式,命名了永州水石胜迹,留下了多处摩崖铭刻,且在对待山川命名的时候,元结是敢于创新,敢于自我作古的。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、最闻名遐迩的便是《大唐中兴颂》。

元结对永州山水的认同,根底在于他对永州“水石文化”的认同。在元结眼中,这些山水泉石“堪赏”“可爱”“可赏”,而且“可就”“可家”,他为它们不为人知赏而惋惜不止。元结使永州摩崖成为南北乃至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,并由此形成永州摩崖石刻的地方性。

永州摩崖的出现,与永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即山水崖石密切相关。由元结的诗文意象所描述而言,永州本土文化可以称之为“水石文化”。元结所开创的永州摩崖石刻,丰富了中国摩崖石刻的内涵,另一方面,摩崖石刻又以特殊的方式,开辟永州山水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新境界。元结对三吾胜迹、阳华岩、朝阳岩等地方自然景观的命名,也成为建构永州地方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在永州摩崖石刻中,最为引人注目的三个人物分别为唐代的元结、宋代的周敦颐和黄庭坚。他们正好从道德(思想)、文章(文艺)、政事(事功)三个不同的维度,开发永州石刻的文化意义,成为永州石刻的三个文化符号系列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:道德、文章和政事这三个维度,分别对应周敦颐、黄庭坚和元结三位名贤,分别对应铭文(如《大唐中兴颂》)以及后来的《大宋中兴颂》、《大明中兴颂》等)、榜书(包括题名、题写景名和以道德箴言为内容的榜书三种内容)和诗文三种文体。这些石刻不仅丰富了永州地方文化和古代石刻文化的内涵,而且从永州摩崖的特殊角度,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与特色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、教授)



浯溪摩崖石刻远眺。

